

# 百年革命史迹 | 人物篇



刘宗歆(1912-1941)

刘宗歆(1912-1941),浙江上虞人,1912年6月出生于原籍横塘乡,后被在上海一家银行做经理的父亲接到上海,先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后进同济大学医学院学习。

同济大学很早就建有中共地下组织,刘宗歆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逐渐形成。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931年9月下旬到12月,上海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曾三次组织数千学生赴南京请愿。刘宗歆参加了其中的两次。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犯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抵抗,伤亡较重。同济大学的学生积极响应救国会的号召,参加救护伤员、救济难民等活动。刘宗歆还建立起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师生们紧张地投入到该医院抢救伤员的工作中。随着上海的失守,同济大学开始内迁。医学院的学生分三路迁内地,一路上边迁移边掩护伤员转移。刘宗歆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1938年7月,刘宗歆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金华大队第6

## 在反细菌战中奏出“生命交响曲”的刘宗歆

中队第67医疗队,任医师。该队在金华组建后,经淳安、屯溪、黄山、太平至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67队由3名医师10余名护士、护理人员组成。到军部后又分成3个小组,刘宗歆带领一个组到山河口军部后方医院,在那里与新四军的医务人员并肩战斗。

刘宗歆在军部后方医院主持外科及传染科(主要是肺结核)的医务工作,同时还兼任新四军军部高级护士训练班《简易外科学》教师。在一般情况下,上午查病房,下午做手术,少则四、五例多则10余例。前方有伤员送来时,随时进行抢救和手术。在军部后方医院工作的2年多时间里,他还曾2次冒险回上海筹集药品和器械。

当时医疗队的人员与新四军的医务人员不仅工作上互相配合,而且一起参加政治和业务学习,在一起搞文化娱乐活动,亲密无间,形同一家。开文娱晚会时,刘宗歆常表演口琴吹奏。有次去上海筹集药品返回后方医院时,受到了热情欢迎,刘宗歆报告上海的情况,会场里高呼口号:“欢迎刘大夫,我们要加紧学习!”。1940年元旦,副军长项英主持干部午餐会,刘宗歆与另一位医疗队的医师也应邀参加,项英等亲切接见了他们,并摄影留念。

刘宗歆在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工作期间,热情关心伤病员,努力解除他们的痛苦。对工作不管份内份外,只要需要,一样主动承担。如有一时期部队战士受疟疾之害,他就主动配合内科,参加防治疟疾的工作,有位女同志要临产了,他就担负起接生的任务。他的良好医德和精湛医术,在新四军后方医院有口皆碑,伤病员热情地称赞他是一位正直、爱国的好医生。

这时,他也深深地感到共产党、新四军是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是真正

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他萌发了参加新四军,跟共产党走的决心。1940年春,在又一次回上海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时,就把妻子和一子一女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驻地。在工作之余,教妻子学习简单的医药护理知识,并让她参加一些包扎、换药等护理工作。同时,向妻子宣传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救国的政策,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一起申请参加新四军。可惜这愿望由于情况的变化而未能实现。

日本帝国主义在妄图用枪炮武力迅速征服中国的迷梦破灭后,灭绝人性地搞细菌战。1940年在浙江、湖南等地散布带有鼠疫细菌的跳蚤,使那里的不少地区蔓延起鼠疫恶症。

此时,刘宗歆正由皖南回到金华,奉命担任第312医疗队队长,率队奔赴浙江衢县,投入到扑灭鼠疫的新战斗中。1941年秋冬,义乌也发生鼠疫。由于鼠疫的传染力极强,在防治鼠疫的医务人员中极易感染。刘宗歆毫不惧怕,当义乌出现鼠疫需要组建去义乌防治的医疗队时,他主动请战,率队前往。刘宗歆经常对医务人员讲:大敌当前,为国家、为人民,要有爱国思想和献身精神,要有所畏惧的气概。并以身作则,深入到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在与鼠疫作斗争时,他不拘泥于一般原则,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

1941年底的一天傍晚,刘宗歆刚吃过晚饭,正要回宿舍时,有一位老太太前来请刘大夫给她的女儿看病。刘救人心切,当即赶到现场,方知病人患的是肺鼠疫,在救治的过程中,刘宗歆不幸感染了病毒。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经抢救无效,刘宗歆不幸于1941年12月30日晚上8时以

身殉职。牺牲时年仅29岁。

全国解放后,由上海国泰影片公司摄制了以刘宗歆为原型的电影《生

命交响曲》。1986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刘宗歆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



▲1942年6月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义乌搞细菌战,刘宗歆在义乌鼠疫防病期间不幸病毒感染而殉职



▲抗战时期,同济、浙大部分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学生在浙江金华。



郑文道(1914-1942)

郑文道(1914-1942),1914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父亲是水手,郑文道从少年时就开始离开母亲随兄嫂生活,开始在山东省的烟台,以后又迁往青岛,在青岛礼贤中学读至高中。

1933年夏,郑文道高中尚未毕业,他就与侄儿郑香山一起报名投考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被录取在机械科。入学后,在地下党员景智德的影响下,常在课余时间阅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政治,并参加学生爱国救亡运动,还和郑香山一起参加学校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1937年夏,经过四年学习,郑文道从同济大学毕业。学校介绍他与郑香山一起去民生轮船公司就业,报到之前先回青岛度假。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侵华战争,郑文道与郑香山就在当地与山东大学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由中共青岛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投身抗日战争。叔侄俩曾奉命趁日寇尚未控制青岛的有利时机,炸毁了青岛码头

## 抗日战争中我党情报战线的英雄郑文道

仓库和市郊的铁路大桥。

1938年1月,郑文道来到上海,找到同学、中共党员、已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景智德。当时,上海组织正好要送干部到江阴梅光第游击队处工作。经景智德推荐,郑文道被安排去江阴参加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游击队)。经过战斗考验,郑文道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因郑文道胆识过人,党组织将他调至中央特科,参加我党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负责同“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日本同志中西功联络。

1940年4月以后,由中西功出面活动,在“满铁上海事务所”下面先后成立了“时事研究室”和“满铁特别调查班”,作为“满铁”的附属机构。经中西功的巧妙安排,郑文道化名程和生,以研究员的名义打入了“满铁”。郑文道除了在“满铁”开展地下情报活动外,党组织还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即由他担负我南京情报组织在汪伪政府和日军华中最高指挥部搞来的上层重要情报的接收和转送工作。

郑文道在“满铁上海事务所”数年中,以对党对人民极端忠诚、极端负责的精神,默默无闻地工作。他把从中西功处和南京送来的许多重要情报,及时地送交党组织,再由党的地下情报组织,源源不断地运用各种方式转送到延安。这些情报内容重要,如“大连满铁总部”每月向日本政府上报的情报,日本政府对南京汪伪政府的照会文件,日本政府对“兴亚院”所作的工作指示;甚至有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和日军大本营会议内容等最上层的战略情报。当日伪军拟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扫荡

时,郑文道及时将情报报告上海特科,特科又迅即转报党中央,党中央立即作出相应对策。有一次,我抗日根据地接到了郑文道转去的一份日军准备袭击我派往河北敌后去的干部情报,立即改变输送路线,使日军扑空,保护了一批干部。

1940年底,日本御前会议上,陆海两军首脑就日军今后在亚洲是北进还是南进的决策展开辩论,结果御前会议决定采取海路南进政策。期间,延安两次来电询问上海特科:“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经上海的中西功和南京的西里洛夫证实,日本确已采取了南进部署。这一重要情报,也是由郑文道传递给上海特科答复延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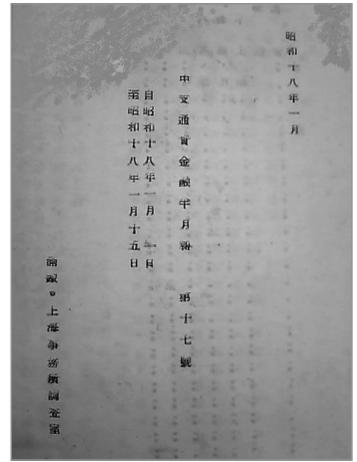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左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该案牵涉人员很多,使日本警视厅大为震动,决定对国内外的所有情报机构进行审查。中西功将此危急情况告知郑文道,要上海组织迅速应变,设法撤退。郑文道得悉

后,迅即将此危急情报向领导作了汇报,并对自己的住处又进一步作了认真的检查,不留下任何片纸只字。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被捕。因中西功曾介绍郑文道到“满铁”做雇员,敌人当即怀疑到郑文道。

1942年7月29日清晨,东京来上海的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在上海拉都路敦和里28号三楼逮捕了郑文道,搜查了房间,但一无所获,郑文道一口咬定与日本人仅是职业关系。敌人又追问郑文道与中国人刘国光的关系和刘国光的住址。郑文道坚不吐实。在日本宪兵把郑文道押往北四川路日军宪兵司令部再作审问的途中,当车子驰至江西中路汉口路附近时,郑文道突然纵身跳出车厢,因猛烈撞击摩擦,流血过多,身负重伤,神志昏迷,在被日军押送医院治疗期间,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党内同志和日本友人,郑文道趁敌人疏忽不备之际,突然跃起,从四楼病房的窗口跳下,当即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原北四川路日军宪兵司令部



▲当年满铁上海事务所历史档案



▲中西功,日本反战人士、郑文道打入满铁事务所的介绍人和联络人